



《诗经》

韵读图解及其它

Shijing yundu tujie ji qita

庞存周 著

▲ 重庆出版社

《诗经》

韵读图解及其它

庞存周 著

▲ 重庆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杨直培
封面设计 卢 军
技术设计 刘忠凤

庞存周 著

《诗经》韵读图解及其它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8.25 插页 6 字数 384 千
1999年1月第一版 1999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*

印数：1—1,500

ISBN7-5366-3927-9/G·1434

（精装）定价 29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庞存周，1915年5月4日生，四川南充人，前华西大学文学士，前川北大学教授，现任渝州大学教授、导师。原治朴学，系出章太炎先生门下，精辟地阐述了“六书·转注”之奥义；解决了古代诗歌韵律长期纷争的难题。也治文史哲学，并首开“古代人才学”。专著已刊者有《诗经韵读图解》、《六书转注说》、《从方言的角度来探索古代诗歌韵读问题》、《史记中的人才学》、《诗词曲鉴赏及写作》，以及书法理论《论孙过庭书谱中书品与人品的关系》、《论诗词书画艺术的功力与境界》等专著和论文。其中多种已列入国家级论文专著并获奖。自幼爱好书画艺术且曾在“东方美专”毕业。画宗宋元而参以西法；书则深研真草篆隶，尤擅长于“八分书”、“行草书”及金石

篆。曾多次参加日本札幌市中国优秀作家常设展厅的展出并获奖，墨迹已收入一些国内外书画选集。现为“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文化艺术委员会”学术委员、特聘书画师。“华夏书画艺术人才研究会”会员，“重庆老年书画研究会”顾问、“重庆诗词学会”顾问、“重庆香国诗书画研究会”副会长、顾问，“重庆市老教授协会”理事，“重庆市江北区老年书画研究会”副会长、顾问，“渝州大学文学艺术研究会”会长。〔通讯地址：重庆江北区观音桥小苑2村42号——渝大教授宿舍。 邮编：400020 电话：(023)67711721〕

（录自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《世界名人录(中文版)》）

（录自中国人事出版社《中国当代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大辞典》）

序

孟广涵

《诗经》是举世公认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在其被尊之为儒家五经之前，通称之为《诗》。除其逸诗外，有题有诗总计 305 篇，概数 300 篇，是距今 2500 年前之作。它成集约于公元前 6 世纪。据考，孔子曾整理过《诗》之乐章，使“雅、颂各得其所”。《论语》，称其为《诗三百》。

其诗各篇皆可合周廷之乐而吹拉弹唱演绎舞蹈。全诗分设国风、大雅、小雅、颂四部，近乎音乐之分门别类。风为乐调；国风为各地民歌。雅分大小，类乎大小乐曲。颂为祭赞之辞，亦曰祭乐。《毛诗序》：“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”然则“颂之声较风、雅为缓”（王国维《说周颂》）。

民歌民谣为国风及小雅中最有价值之部分。乃民间采集聚于周廷之后，经加工演练而成。讽、颂之作，大部分出自公卿列士之手。然祭祖、宴宾、征战、狩猎之什、可能是巫医或史官之所为。

显见的是：采自民间之诗，历经增删改易、调句换韵，大体已改土语为雅言。

战国之时，《诗三百》则被列为群经之首，设置馆舍传经习《诗》，爰及汉代更其甚行。鲁人毛亨所传之《毛诗》，即为今之《诗经》。可惜汉初齐、鲁、韩“三家诗”，俱已亡逸。孔子之后，《诗三百》之风乃大行于世，至有“不学《诗》无以言”之说。

庞存周教授潜心数十载，精研《诗经》与中上古音韵，且结合之为《〈诗经〉韵读图解及其它》硕果，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。该书以图示解之，正音正字以匡其舛，反璞以归真，乃新建树新创举。

庞教授 1915 年生，四川南充人，前华西大学文学士，现任渝州大学教授、导师。原治朴学，系出章太炎先生门下，精辟地阐述了“六书转注”之奥义；解决了古代诗歌韵律长期纷争的难题。也治文史哲学，并首开“古代人才学”。专著已刊者有《〈诗经〉韵读图解》、《六书转注说》、《从方言的角度来探索古代诗歌韵读问题》、《〈史记〉中的人才学》、《诗词曲鉴赏及写作》，以及书法理论《论孙过庭书谱中书品与人品的关系》、《论诗词书画艺术的功力与境界》等专著和论文。其中，多种已列入国家级论文专著并获奖。

我不甚懂音韵学，但曾听过庞教授关于古代诗韵之讲解，粗略懂得《诗经》之韵律，从时代言之，则为隋唐以前上古之音；以地区言之，则为全国各地民歌之汇总。因而全书三百篇不能以某一地之音统之（朱元晦曾以“叶音”作尝试而归于失败），也不能以后代之音去规范之，因语音已随时代而有所改变，古音之合者现在未必皆合，如一切以后代所出诗韵部类读之，则往往分歧而不能协调。明清

诸大家如顾炎武、江永、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孙皆欲解决此问题而毕生致力于此，而以段氏《六书音韵表》成功最大，嘉惠后学非浅。但由于当时学术界恪遵“圣训”，受到《切韵》以来直至《佩文诗韵》为止之今声韵影响甚大，诸大家有时亦未敢多有出格，未能形成权威性之古声韵理论。直至章太炎先生出，才去除今声韵之影响而专以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及汉魏乐诗为根据，结合方言来研析其音韵之变化，著《文始》及《成均图》以解释音之流变转化，用当今各地方音与古诗发音作比较而探寻出新途径，即以方言为基础而推寻古韵，于是一切疑难皆得到理论上之解决。然而章先生享年不永，未能完工，其弟子黄侃、李植、钟稚瑠、赵少咸等继续在今古韵学上综合深入探索，更证明以方言为基础而研究古韵为唯一可行之途径。庞存周教授即受学于章氏之门，继承诸先贤之事业而一一以古诗歌实证之，即以章氏理论为开锁钥匙而解决具体问题，充分发挥方言研究在实际阅读古代韵文上之作用。其初稿在 60 年前经诸老先生特别是赵少咸、钟稚瑠先生细心修改充实，大大发展了章氏之学。现存之稿只是“火劫之余”，但在古韵衍变系统规律上仍保留得较为完整；通过《诗经》而展示出古代很多音读之规律性，更通过《六书转注说》而揭示出各地方言演变之途径，这是对古韵这个“冷门”的开发起了承先启后的极大作用的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，也可以认为是近“绝学”之著作，可以为今后之研究真正古韵者指出一条简捷之途径。四川师大古代文化研究所王仲镛教授读此作后，认为“据方音以定韵读，简捷合理，实较晦庵叶韵之说为胜。窃谓此一创说

可以成立，亦能推广也。”又云：“六书转注之义，晦而不明，今据太炎之说，广征类例，识解明白深透，殆无余蕴。”四川大学中文系甄尚灵教授也评此书云：“语言总是有方言的差异，同一来源的方言，其共时的差异常能反映出该语言的历时变化。存周教授用方言来解读古代韵文，当然是合乎语言的演变规律的。”两位教授的评议实事求是，非常精当。我为重庆出版社在科教兴国的浪潮中出版这部力作感到鼓舞，特写此小引以弁其端。

1997年3月 于重庆

序 二

王仲鏞

老友庞存周同志寄示刊载在《渝州大学学报》1988年4期上面的近作《〈诗经〉韵读图解自序》一文。原书是50年前我们在华西大学中文系同班毕业时，他所撰著的毕业论文，现在重加补充修订，成为一部探讨《诗经》韵读的新作。

关于书的内容提要 and 写作意图，《自序》中已作了很好的说明与论证。他是要从方言的角度来探讨古代诗歌的韵读问题，试图在前人走过的道路之外，另辟一条新径。对于文字音韵方面，同班同学当中，存周同志和现在四川大学的甄尚灵同志是专门之学。我不过粗知大略，以为读书之助而已，读了他的《自序》，只觉得简单明了，合情合理，可以推行。赞赏之外，却难旁赞一辞，但他来信一定要我写篇序，说是两月前相约在重庆见面，我临时因故没去重庆，他“步行”见访，扑了个空，所费气力和时间，这算是补偿。我只得勉力而为，讲几句强作解事的外行话。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三百零五篇诗，绝大部份采自民歌，按政治区域划分为“十五国风”“二

雅”“三颂”，实际上只是陕西、河南、山东以及山西、河北一部份，安徽、江苏、湖北的小部份地区而已。诗歌产生的时间在西周之初至春秋之末。自从孔子把它编订成书，以作教授门徒的主要教材以后，两千年来，被尊为“六经”中的一经。当时，“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。”（《史记世家》），因为有节奏韵律，便于歌咏讽诵，人们“口以相传”，所以虽遭秦火，还能完好保存。汉代，传授《诗经》的，有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，他们的训诂和音读，各有不同。至汉末贾逵、马融、郑众、郑玄诸大儒，都推崇《毛诗》，非议齐、鲁、韩三家，“于是三家遂废”（《经典释文序录》）。郑玄又作了《毛诗笺》，现在我们所读的《诗经》，就是《毛传郑笺》的传本。

在《诗经》的传授中，诗中的韵脚，由经师导读，传之口耳。魏晋六朝以后，渐渐有了专门的著作。《经典释文》载：“为《诗音》者九人：郑玄、徐邈、蔡氏、孔氏、阮侃、王肃、江惇、干宝、李轨。”“俗间又有徐爰《诗音》。近吴兴沈重亦撰《诗音义》”。但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载，只有梁时徐邈等撰《毛诗音》十六卷、徐邈撰《毛诗音》二卷。余书俱未著录。《诗音》当然也包含了韵读，我们今天在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和孔颖达的《毛诗注疏》中，还可以见到徐邈、沈重《毛诗音》的点滴。清代乾嘉年间著名学者钱大昕，特别注意了沈重所谓的“协句”。他说：

“沈重《毛诗音》，于《燕燕》首章‘远送于野’，云：‘协句宜音时预反’。二章‘远送于南’，云：‘协句宜乃林反’。沈重生于梁末、其时去古已

远，而韵书实始萌芽，故于今韵有不合者，有‘协句’之例，‘协句’即古音也。自陆德明为古人韵缓，不烦改字之说，于沈所云‘协句’者，皆如字读，自谓通达无碍，而不知三百篇用韵谐畅明白，未尝缓也，使沈重音尚传，较之吴才老叶韵，岂不简易而可信乎？”（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一《“协句”即古音》条）

他认为“协句即古音”。比之宋代吴才老（棫有《韵补》、《毛诗补音》）所谓“叶韵”的办法，更为“简易而可信”。而朱熹的“叶音”说，则是直接承用吴才老的“叶韵”而来（见《四库全书〈诗集传〉提要》）。这种办法，只凭今读，有的地方，把无韵当成有韵；有的地方，又把有韵当成了无韵。而且，往往注音混乱，非今非古，甚至模棱两可，一字注为两个“叶音”。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时间和地域的概念。明代陈第第一个起来反对他，说：“时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字有更革，音有转移，亦势所必至。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，不免刺而不入。”（《毛诗古音考自序》）陈第认为：《诗经》中每一个字只有一个音，有的韵脚上的字音，今音和古音不同，看来似乎走了韵，其实作诗的人用的古音，本来是合韵的。并不须用改读的办法去“叶音”。后来顾炎武根据陈第《毛诗古音考》的道理，进一步考定古读，著成《诗本音》一书，“叶音”之说，便被学者所基本否定了。以后江永、戴震、段玉裁诸家，探究古音，益趋精密。但是，正如存周同志所说的：“诸公都是以《切韵》演变而来的韵部为基础，来讲韵的分合，似乎还在‘雷池’之内打转，所以有些地方引起争议，至今不决。”钱大昕生在陈顾以后，与江、戴、段同时，却提出了“协句即古音”的

说法，可能就看到了这一点。因为《切韵》的编订，主要还是以当时的读书音为标准，并不能完全概括各地的方音。钱氏指出“陆元朗之时，已有韵书，故于今韵不收者，则谓之‘协韵’”。“今韵”即指《切韵》而言。“于今韵不合”却是“古音”，这是他已经意识到了《诗经》的产生，“作之非一人，采之非一国”，在未有韵书以前，而方音自在的缘故。这与存周同志所创“各依方音协韵，取诸口读”的办法，是可以相通的。钱氏对于“古今方音不相远”的情况也有所论征。（见《潜研室文集》卷三《古今方音说》）足以为存周之说张目。所以，存周同志的这种办法，表面上似乎“与朱元晦颇有类似之处”。实质上是不相同的。他可以把《诗经》的韵读问题，解决得更为合理，收到“简易而可信”的效果。

其实，在文学史中，无论是诗、赋、词、曲的产生，首先都是来自民间，然后有文人创作。韵书总是在有了大量文人创作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。即使后代以诗赋取士，有了官定的韵书，著之功令，有的作家，仍然还要使用方音来创作，更不要说民间歌曲了。词曲的当筵命笔，随地取音，求适歌者口吻的情况，就自始而然。即于清真、白石、梦窗号为知音诸大家，词中用韵，也还时时杂有方音，不仅如福州秀才林外《洞仙歌》以“晓、草、老、过、锁、扫”之闽音相叶而已。（见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）由此可见，存周同志从方言的角度来探索古代诗歌韵读方法，是大有可为的。

1989年7月20日

自序

——从方言的角度来探索古代诗歌韵读问题

内容提要

《〈诗经〉韵读图解》是我解放前在华西大学所著。当时率尔操觚，不太完善，幸而流传不广，影响不大。现重新补正改写，为本校 1988—1989 年科研项目之一。

包括《诗经》在内的古代诗歌的韵读问题，自来都未妥善解决。朱元晦谈诗，首先感到这个问题。他自出心裁，创了一个“叶音”的读法，虽然遭到后世不少音韵学家的讥议，但我认为他的办法也未可厚非，总算是力求在“今声韵”的韵部限制之外去另找解决办法，纵有疏失，其意可师。其后顾亭林、段玉裁诸公，都专门对《诗经》韵律作了细致的研究，另列“古声韵”一门，以图沟通隔阂，功绩甚大。但有个缺点是：诸公都是以《切韵》演变而来的韵部为基础，来讲韵之分合，似乎还在“雷池”之内打转，所以有些地方引起争议，至今不决。章太炎先生另立廿三部，也似乎未能使之通彻。我原治音韵之学，又爱文艺，爱阅读各时代各地区的民歌俚曲，偶然从一些歌词的协韵中接触到一个问题：在韵书形成之前，作诗者是如何协韵的？又从所听到的民俗歌谣的演奏中，我找到了一个规律：“各依方音协韵，取谐口读而已！”我想，如以此

去推论古代诗歌的韵脚，岂不恰正是个好办法？历年来我从事各地“方言”的研究，发现竟有好多是现存的古音，与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汉魏诗歌，一脉相通，而与《切韵》以后所出韵书，往往发生歧异。证明了韵书作者在综汇分析古诗音韵时，确实是以“我辈数人，定则定矣”的武断态度，去作“去取标准”的。其入选者当然符合其所订韵书，其所弃而不取者却仍然在各地继续存在，恰可以利用来作为探索手段，去诵读古代诗歌。本着此旨，我试用了几十年来所接触过的方言俗语，对一部分古诗歌韵律作了剖析，可以补顾段诸公之所不及，却与朱元晦颇有相类之处。究竟是不是会被认为是“左道旁门”？我以为反正大家都是探索，何必去论争“帝魏帝蜀”，强分正统呢！

一、从一件小事说起

近年来，曾不断地从各处广播电台播出的“古代诗歌欣赏”或“现代文学名著欣赏”节目中，发觉一个问题：广播员在朗诵古体诗词时，往往失去音律的协调、失去韵脚，大大损伤了诗歌的情味，虽中央台也不例外。当然，他有一个借口，就是“推广普通话”。可是这个节目是“古代诗歌欣赏”而不是“普通话讲座”！作品欣赏，当然要连内容和形式音律一同欣赏，而不能凭主观想法把古诗歌的主要部分——音律截去不要，而只讲其政治内容！诗歌之所以异于散文者，全在“情韵”部分。“情致”这点，有的散文也能做到，而“韵调”呢，则仍为诗歌所独具。若截去这一部分，诗歌散文有何区别？这个问题的症结点何在？我想，其症结决不是推不推广普通话的问题，而是具不具有古代诗歌韵读的知识问题，也是具不具有各地区的方言方音常识的问题。例

如在朗诵毛主席的《蝶恋花》、《西江月》，杜甫的《石壕吏》，李白的《梁甫吟》，古乐府《罗敷艳歌》、《东门行》，以及屈原的《九歌》时，都出现了韵脚错谬、音律不和现象，使人听来不是滋味。其最突出的两点：一是平仄的舛错，造成音节的拗板，这主要是北方音的缺陷造成。加以读诗者师心自用，对不熟习的字，不问不查，以致造成失误。另一点是韵脚错谬与脱失，伤损了诗歌的主要因素——韵律之美。我这里重点只谈韵脚。因古代诗歌本无平仄格律，所以很少涉及，留待讲近体诗时去说。

二、就广播上的部分例子来剖析，并推论古代诗歌韵读的规律及语音，由于时代变迁和地区不同而产生的规律性变化

这里，我想就广播出的“名著欣赏”中几个在韵读问题上比较典型的篇目，来剖析一下协韵问题，提出一些共同规律，对于阅读其他古体诗词，也有借鉴作用，最后推论到《诗经》的韵读问题。

蝶恋花 (赠李淑一) 毛泽东

我失骄杨君失柳△，杨柳轻飏、直上重霄九△。问讯吴刚何所有△，吴刚捧出桂花酒△。 寂寞嫦娥舒广袖△，
万里长空、且为忠魂舞△。忽报人间曾伏虎△，泪飞顿作倾盆雨△。

这阙词我听电台播送和学校有些老师讲读，基本上是不

协韵的。实际上按词的格律，是一韵到底的。打“△”号的都是韵脚。但听一般的朗读，都出了问题：“柳、九、有、酒、袖”五处，大体还可互协，“舞、虎”就另成一韵，“雨”字就孤立，三类凑合拢来，更是互不协调，与“一韵到底”的格律完全不像，于是有人就说“此词可以不协韵”。但奇怪的是，电视上的昆曲演唱手，一边弹琵琶，一边清唱，韵调却又非常协调！是什么原因？当然就只有从方言方音来研讨了，因为现有的韵书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

就此词的押韵，看出一个规律，古代江南地区，确实有部分地方，把“侯、幽、模、鱼(-ou、-u、yu)”混读为一类。据毛主席讲话的录音带，和一些湖南湘潭地区朋友的语音，和昆曲演员的发音来判定，这几部音，在古代是一律读入“模”部(-u)的，现在则部分地方已由“模”变小，转化为“鱼”部(由-u→-iu)，湘潭、苏南大概如此。所以读这几部的字，要化为-iu的韵母才行。这样，我们再读：

我失骄杨君失柳△(里禹切)杨柳轻飏、直上重霄九△(几禹切)

问讯吴刚何所有△(音禹)吴刚捧出桂花酒△(几禹切，音举)

寂寞嫦娥舒广袖△(音序)万里长空、且为忠魂舞△(巫禹切)

忽报人间曾伏虎△(符禹切)泪飞顿作倾盆雨△(读今音-iu)

这就完全协韵了。当然，这种怪僻的音，隋唐以来的韵书也可能因其难读而不取，但毕竟是至今仍然存在的特殊方言，